



好 读 书 读 好 书

在故宫里看中国

野岛刚

我写的《两个故宫的离合：历史翻弄下两岸故宫的命运》一书2011年在日本出版，后来翻译成中文，2012年在中国台湾地区出版，2014年在中国大陆出版。

在台湾和大陆出版时，为了宣传，我到当地接受报纸、杂志、电视等媒体访问的次数相当多。那个时候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：“你是日本人，为什么要写故宫的事情呢？”因为太常被问了，回答多了我也像官员一样，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答案：“在这个世界上，相同名称、相同收藏的博物馆竟然有两个，非常不可思议，似乎可以列入世界七大奇迹了。已经变成两个故宫的存在，在这半个世纪当中，也许发生过很多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但是对于我这个外国人来说，这些事情实在很妙，让人想知道背后的原因。”

当我这么回答之后，接下来我继续被问到：“那么日本人写出这本故宫的书，和其他有关故宫的书，有什么不同吗？”这时候我就会尽情把想到的都说出来：“有关故宫的书已经有很多，但多数都是历史或艺术的专家所写……我是通过故宫这个过滤器，描写与中国大陆、中国台湾和日本有关的亚洲近代史及现代政治。读过这本书的人就会知道，基本上政治和外交的内容应该占了大半。因为故宫就是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，我相信这个观点和过去所出版的故宫书籍完全不同。”

这时候如果对方显得很有兴趣的样子，我就会再继续说下去：“不管是大陆人或是台湾人，一定是用自己的观点去写故宫。大陆人认为北京故宫是直系长男本家，台北故宫是配角。台湾人认为台北故宫是自家，北京故宫是配角。而且对两边来说，这和两岸关系很敏感的部分有关，因此会忽视配角的存在，或是书里写的好像根本不存在。但是对我来说，两边的故宫都是主角，我会将它们想象成一张分离的地图，因为我是外国人，对两岸关系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是政治立场。”

在写故宫问题的时候，我已尽力排除意识形态，不管对于哪个故宫，都尽可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下笔。当然因为我是担任《朝日新闻》台北特派员时所采访，因此在台湾所见所闻为主，与台湾相关的内容占了三分之二，但是在政治上，我誓未袒护任何一方。我开始写故宫时就已决定，我不是要写艺术文化，而是要通过分析政治、历史、社会，当作一种手段来写文化。在分析中国问题方面，现在的日本是否过度忽视文化这一块，是否刻意避开中华文明要素，对此我想提出我的批判。过去，对于日本人来说，中国就是中国文化。尤其是在江户时代受教育、在明治维新以后提倡中国论的那些人，多半是如此，如内藤湖南、桑原藏、狩野直喜、白鸟库吉、吉川幸次郎、青木正儿等。他们经常通过文化谈中国，这样的传统一直维持到战后的竹内实、竹内好。但是到了“文革”，日本的中国论开始远离文化。

然而，要理解中国及中国国民，还有，如果要理解日本和日本国民，究竟是不是可以忘记中国文化这件事，我心中充满疑问。

为什么我们使用汉字？为什么要在学校写书法？为什么名人的客厅会挂画轴或画来装饰？为什么日本的茶道喝抹茶？

这些有关日本文化根源的问题，如果不懂中国文化是回答不出来的。但是到了今天，我们对于中国文化，虽然在地理空间上相邻，但在精神上却有点分离，连这样的提问也变少了。最近二十年来，中国经济急速发展，大国崛起，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，对于理解中国的需求这么高，其中，故宫正是了解中国的好教材。光是故宫收藏的文物，便充分反映了中华的历史，与其阅读写得不好的中国史书籍，不如把重心放在中国历史当中。例如，要想解读“嘉量”这件文物，就必须理解秦始皇统一天下的经济政策，“嘉量”象征统一度量衡的事业。从苏轼的《赤壁赋》可看到北宋当时的政治情况，甚至也会浮现三国时代动荡的意象。在爱好艺术的风流天子宋徽宗身上学习，也必知道北宋政治弱化及灭亡的悲剧。从青花瓷中，也可知元帝国拥有广大领土连接西方，向中东及欧洲地区大量输出，迎向大航海时代的到来。

此外，如果想要了解中日的近代史，通过故宫是最容易弄清楚的。故宫博物院的诞生是因为清代的灭亡；故宫文物从北京迁移到上海、南京是因为日军侵略中国的东北和华北地区；故宫文物开始从南京迁移到四川，这是因为中日战争全面爆发，日军已逼近南京；故宫文物跨海到台湾，是因为蒋介石输掉国共内战。北京和台北的两个故宫，延续着两岸的分离。

这样一路分析下来，我们可以知道故宫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。文化反映了中国所有的东西，那么中国人也通过文化反映了自己的历史和命运。



读懂故宫

刚刚过去的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，说起中国最知名的博物馆，非故宫莫属。因为故宫一家的收藏，就占到了全国文物总量的一半。故宫有为数众多的国宝级文物，石渠宝笈特展的时候，那么多人排队数小时只是为了扫一眼那些国宝，这正是文物特有的魅力。

李泽厚先生在《美的历程》里推荐读者去博物馆做一次美的巡礼，本期“书坊”周刊介绍故宫的专题，也是希望大家有机会走进博物馆，领略文物之美，如李泽厚先生所说：“那人面含鱼的彩陶盆，那古色斑斓的青铜器，那琳琅满目的汉代工艺品，那秀骨清像的北朝雕塑，那笔走龙蛇的晋唐书法，那道不尽说不完的宋元山水画，还有那些著名的诗人作家们屈原、陶潜、李白、杜甫、曹雪芹……的想像画像，它们展示的不正是可以使你直接感到的这个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么？时代精神的火花在这里凝冻、积淀下来，传留和感染着人们的思想、情感、观念、意绪，经常使人一唱三叹，流连不已。我们在这里所要匆匆迈步走过的，便是这样一个美的历程。”

与古代文明对话

祝勇

在写过故宫书画和建筑之后，我隐隐地有了写故宫“古物”的冲动。

有一点是明确的：这注定是一次费力不讨好的努力，因为故宫收藏的古物，多达一百八十六万多件(套)。我曾开玩笑，一个人一天看五件，要全部看完，需要一千年，相当于从周敦颐出生那一年(北宋天禧元年，公元1017年)看到2017年。这实在是一件幸福的烦恼：一方面，这让故宫成为一座“高大全”的博物馆，故宫一家的收藏，已接近全国文物总量的一半，而且超过90%是珍贵文物，材美工良，是古代岁月里的“中国制造”；另一方面，这庞大的基数，又让展示成为一件困难的事，迄今为止，尽管故宫博物院已付出极大努力，文物展出率，也只有0.6%。也就是说，有超过99%的文物，仍难以被看到，虽近在咫尺，却远似天涯。至于书写，更不能穷其万一——《故宫的古物之美》这本书所写十八篇，是一百八十六万的多少分之一呢？这让我感到无奈和无力。这正概括了写作的本质，即：在庞大的世界面前，写作是那么微不足道。

这让我们懂得了谦卑。我曾笑言，那些给自己挂牌大师的人，只要到故宫，在王羲之、李白、米芾、赵孟頫前面一站，就会底气顿失。朝菌不知晦朔，而螾蛄不知春秋，这不只是庄子的提醒，也是官殿的劝诫。六百年的官殿(到2020年，紫禁城刚好建成六百周年)、七千年的文明(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史)，一个人走进去，就像一粒沙被吹进沙漠，立刻就不见了踪影。故宫让我们收敛起年轻时的狂妄，认真地注视和倾听。

故宫让我沉静——在这座官殿里，我度过了生命中最沉实和安静的岁月，甚至听得见自己每分每秒的脉搏跳动；但另一方面，故宫又让我躁动，因为那些逝去的人与事，又都凝结在这官殿的每一个细节里，挑动我表达的欲望——

我相信在它们面前，任何人都不能无动于衷。我把这些物质称作“古物”，而不是叫作“文物”，正是为了强调它们的时间属性。

每一件物上，都收敛着历朝的风雨，凝聚着时间的力量。

正像1914年在紫禁城内成立中国第一个皇家藏品博物馆，就是以“古物”来命名的。它的名字叫——古物陈列所。

物是无尽的。无穷的时间里，包含着无穷的物(可见的，消失的)。无穷的物里，又包含着无穷的思绪、情感、盛衰、哀荣。

面对如此磅礴的物质书写，其实也是面对无尽的时间书写。我们每个人，原本都是朝菌和螾蛄。

当我写下每个字的时候，我知道自己陷入了不可救药的狂妄，仿佛自己真如王羲之《兰亭序》所说，可以“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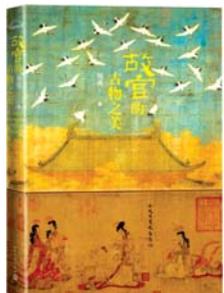
但我知道我不是写《碧城》诗的李义山，“星沉海底当窗见，雨过河源隔座看”，一个人面对岁月天地，像李敬泽说的，“是被遗弃在宇宙中唯一的人，他是宇航员，他的眼是3D的眼。”我只是现实世界一俗人，肉眼凡胎，蚍蜉撼树。我从官殿深处走过，目光扫过那些古老精美的器物，我知道我的痕迹都将被岁月抹去，只有这官殿，这“古物”会留下来。

我笔下的“古物”，固然不能穷其万一，甚至不能覆盖故宫博物院收藏古物的六十九个大类，但商周青铜、秦俑汉简、唐彩宋瓷、明式家具、清代服饰，都尽量寻找每个时代的标志性符号(唯有历代书画，将另写一本书，名叫《故宫的纸墨余香》，但本书仍难免涉及一些古代绘画，为所谈“古物”提供图像证据)，通过一个时代的物质载体，折射同时代的文化精神，像孙机先生所说的，“看见某些重大事件的细节、特殊技艺的妙谛，和不因岁月流逝而消褪的美的闪光”。我希望通过我的文字，串连成一部故宫里的极简艺术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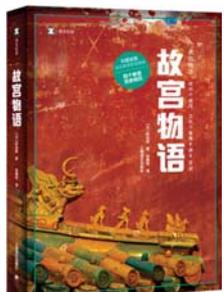
我认真地写下每一个字，尽管这些文字是那么粗疏——只要不粗俗就好。我知道自己的笔那么笨拙、无力，但至少，它充满诚意。

它是对我们古老文明的惊讶与慨叹，是一种由文化血统带来的由衷自豪。

尽管这只是时间中的一堆泡沫，转瞬即逝，但我仍希求在“古物”的照耀下，这些文字会焕发出一种别样的色泽。



《故宫的古物之美》 祝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《故宫物语》 野岛刚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